

背叛、離散敘述與馬華文學

• 沈 雙

摘要：本文借助對於「背叛」的哲學與倫理意義上的思考，探討冷戰時期馬華文學以及當下以英文寫作的華馬文學的文化政治，同時反思當下馬華文藝理論論述中對於「文學性」與「社會性」的思考。本文首先針對有關「背叛」的理論進行闡釋，之後再將之運用於有關馬華文學的討論中去，試圖帶出馬華文學的核心問題以及種種思考。文章最後回到馬華文學對於「三年零八個月」（馬來亞日佔時期）的回憶以及書寫中來，一方面強調這一歷史敘述並不是與當下現實無關，另一方面也強調「背叛」這一主題不止具有毀滅的創傷性，而且具有創造性。

關鍵詞：馬華文學 華馬文學 世界主義 背叛 離散

從某個角度說，張愛玲的小說《色，戒》是有關太平洋戰爭的「原敘述」(urtext)，並不是因為它最真實地表現了戰爭，而是因為小說的主題——背叛以及身份的問題在戰爭敘述中常常出現。試想一下當下中國大陸的電視劇，不少描寫戰爭的故事都是以雙重或多重的間諜作為主角的。對於間諜的「忠誠」程度的強調，與相對「背叛」的控制和處理是成正比的。當我們把視線轉移到太平洋戰爭的另一個戰場——受大英帝國挾制的馬來亞時，我們就會發現「背叛」同樣可以說是一個戰爭的母題。

馬來亞日佔時期短短的「三年零八個月」（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畢竟是一個歷史的問題，它該如何回應當下現實的考量？本文試圖將對於「三年零八個月」的敘述與近幾年關於「馬華文學史」以及「馬華文學」^①的身份的討論聯繫解讀。關於馬華文學史的討論，使我們意識到沒有辦法將「國族」、「種族」、「語言」這些範疇不加反思地運用到馬華文學的研究中。馬華文學的實踐者和研究者李有成曾在近著《離散》中提醒我們「國家文學作為一個規範性概念的局促與不足之處」^②，而「離散」(diaspora)理論實際上與關於「背叛」(betrayal)的敘述存在着一些內在的聯繫，兩者都與民族國家之間產生一定的

張力，同時都不能等同於「去國家」(de-nationalize)或者「後國家」(postnational)這些範疇。所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背叛」有助於我們理解「離散」理論。

我這樣說，絕不是指「離散」的主體或者移民就是「背叛者」。簡單地作標籤化的命名，只會讓我們將有關「背叛」的負面感情（「叛徒」或者中文語境中的「漢奸」是多麼嚴重的指控，多麼沉重的歷史包袱啊！）移諸於移民之上。但是，如果我們可以將「背叛」的道德譴責意味放到一邊，而從個人「從屬」(belonging)與政治文化體制(institution)之間的關係這個角度來看待「背叛」行為，那麼「背叛」就不止具有負面的意義，也可能具有積極的意義，因為它帶來更深刻的有關民主政治模式以及多元文化的機制的思考。俗話說「愛之愈深，恨之愈切」，而最刻骨銘心的「背叛」恰恰是來自於所謂的「自己人」。然而這個「自己人」和「自己」之外的「他者」應該是甚麼樣的關係呢？為甚麼有的「他者」就不能被接納進來呢？傳統對待叛徒的看法是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個人身上，然而換一個角度來說，「背叛」以及「背叛者」是否也因此而揭示出「從屬、認同，以及被驅逐以外的複雜性」呢^③？

本文首先針對有關「背叛」的理論進行闡釋，之後再將之運用於有關馬華文學的討論中去，試圖帶出馬華文學的核心問題以及我對這些問題的理解和看法。文章最後回到馬華文學對於「三年零八個月」的回憶以及書寫中來，一方面強調這一歷史敘述並不是與當下現實無關，另一方面也強調「背叛」這一主題不止具有毀滅的創傷性，而且具有創造性。

一 有關「背叛」的理論思考

在新近關於「背叛」的理論敘述中，尤其是那些關注跨文化、跨語言以及跨界的文化現象的研究，都認為不應該把「背叛」只看成是一個主題，而是應該作為一個視角，並以此切入「主體意識」^④。這些女性主義學者以及少數族裔文化研究學者都指出，「背叛」應該被賦予更加複雜的敘說，而不是簡單地從道德制高點進行鞭笞或者對之表示憤慨。背叛撕裂了既有的情感關係或者社會關係，其帶來的創傷一定是慘痛的。雖然有的背叛沒有道德負擔，但並不是所有的背叛都是如此。「背叛」是主體對於多重社會結構對之發出的多種「忠誠」要求的一個回應，因此它體現了主體在多種「忠誠」之間的迂迴。因此，仔細研究「背叛」可以使我們認識到「從屬」和身份是如何形成，以及更加清楚地了解「集體認同與主體性」是通過甚麼樣的邏輯建立起來。如果「背叛」能夠使我們不斷反思集體認同所經常不意識到的暴力，那麼「背叛」就不只具有破壞性，而且具有建設性。

「背叛」的背後是一個二元化的結構：要麼被包括，要麼被排斥；要麼是無罪的，要麼是有罪的。紐約大學的亞美文學研究者帕里克(Crystal Parikh)指出民主社會的政治結構也是建立在這個二元結構之上，如果要超越它，或許可以從道德哲學的角度對於民主結構進行反思。民主結構的哲學依據是一個主體和他者之間的關係。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和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都曾指出，主體和他者之間是互相依靠但又是不能融為一

體的。我們很難改變這個二元結構，但是當我們以某個他者作為對象界定主體的時候，同時會有其他的他者是不被認可的。不管是主流的國家主義或者是從少數族裔利益出發的國家主義，都會認可某些他者，而不認可其他他者。這也是為甚麼「背叛」和戰爭有着緊密的關係。戰爭令國族政治具有至上的位置，其他的「從屬」都被置於第二位。再以亞裔美國研究為例，很長時間它就偏愛在美國土生土長的亞裔，而對處於「遊寓」狀態的亞裔相對忽視^⑤。如果我們希望民主機制是開放的，不斷完善的，那麼我們必須對這些被忽視的形形色色的「他者」作出回應。「背叛」的發生恰恰可以提醒我們這一點。有論者也談到了類似的情況，比如當亞裔的女性面臨着族裔以及性別的從屬之間的衝突時，通常會通過「背叛」來應付這種多重身份的要求^⑥。

在閱讀這些文化研究理論之後，我們就會發現既有的對於主體和他者以及民主政治體制深入的哲學性理解，實際上也有一定局限。上面所提到的學術成果都是用英文寫作、在美國出版的文學專著，或者是針對美國的情況而闡述的文化政治，不能將它們普遍化。這些學者對於「離散」族群有很深的關注，但是對於「離散」作為一個文化生產空間的意識卻非常薄弱。他們對於「離散」族群的理解，反映了對於哲學思考、文化政治的偏愛和關注，而相應的就是對於歷史研究，特別是文學史的研究以及多語言的文化實踐的忽略。有的學者將「離散」理解為「主流國家敘述以及少數族裔的國家主義敘述所共有的，為了區別本地人與外來者所設置的界限」^⑦。當他們認為「離散」是一個幽靈，沒有辦法代表自己講話時，按照列維納斯的邏輯來說是講得通的，但是就一筆勾銷了「離散」族群的自我表述。「離散」族群並不是沒有自我表述，關鍵是他們用的是甚麼語言，針對的是哪一個對象。又或是當這些批評者強調「背叛」的社會政治意義時，他們是怎樣去討論「文化上的背叛」？

在學術界「後學」興盛的當下，無論是談到「背叛」還是「離散」，都與後結構主義有密切的關係。從「後學」的角度來說，對於「背叛」的正面評價居多，可以說已經非常有效地將「背叛」從一個負面的字眼轉化成了具有正面效果（反叛或跨界）的文化範疇。甚至可以說，對於「背叛」的美化已經取消了「背叛」本來的意義，使之變得沒有必要了。但是文化歷史和現實並不是這樣的。中文裏的「奸」字就比英文的“betrayal”具有更大的穿透力，其破壞程度恐怕不是那麼輕易就能化解掉。美國研究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的學者石靜遠（Jing Tsu）也曾在作品中，反駁某些後殖民主義理論家對於少數族裔作家打入主流文化過份理想化的說法，認為雙語作家還是要不斷面對文化和語言邊界的審查^⑧。說到底，這是一個歷史觀的問題。受後結構主義影響的「文化政治」，也不可能取代對於特定歷史時空裏文化與政治關係的考察。「離散」也不能說是「國族」之「後」，其存在的歷史遠遠先於國族的歷史。這些考量都影響到我們對於「背叛」的社會意義的期待。「背叛者」是否一定有不為人知的「忠誠」？電視劇通常是要強調正面意義的，但是我們知道這是應和現實政治和市場的需要。張愛玲在作品中書寫的「背叛」只是讓我們看到了其文化政治的從屬問題的複雜性，而且好像複雜程度有增無減，不管她是怎樣出走、流亡和規避。如果以她為例，「背叛」的社會政治意義並不像當下激進的文化批評家所期待的那樣積極，但是因此就沒有意義了嗎？

這些思考讓我想到另一種有關「背叛」的敘述，那就是王德威提到的「後遺民寫作」。在以此為題的文章中，王德威從「忠誠」（而不是「背叛」）入手來解構「忠誠」。他寫道：「『遺民』的『遺』字可以有數解：遺是遺『失』——失去或棄絕；遺也是『殘』遺——缺憾和匱乏，但遺同時是遺『傳』——傳衍留駐。」^①當「忠誠」的對象已經不復存在，「遺民」就變成了一個沒有核心卻又不能停止旋轉的陀螺。而它的時間性——其不斷複製而構成的文化歷史——使得「遺民」和「移民」與「殖民」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其「朝代的、種族的、國家的、文化的、地域的」等等複雜的含義^②。如果把王德威對於「後遺民」的敘述同時詮釋成對於「背叛」的敘述的話，那麼應該說「後遺民寫作」增加了「背叛」的目的之模糊性。因為如果「他所欲念的君主也許仍然長相左右，也許根本就是缺席的偶像，幻魅的幻魅」^③，那麼無論是「後遺民」還是「背叛」都不是為了建立一個另類的政體，而意在表達一種不斷錯位的創傷與時間性。這樣的對於「背叛」的敘述，當然比德里達所嚮往的「未來的民主」（democracy to come）或者其他學者所期待的「反叛」（subversion）要負面一些^④，但是這個敘述的優點在於提醒我們「背叛」之後可能進入的新的意識形態窠臼。此外，這個敘述的長處在於其植根於文本的歷史，強調了「後遺民」或者「背叛」在歷史上的衍生性。

總結起來，關於「背叛」的理論敘述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背叛」並沒有像「越界」聽起來那麼正面，這就如同對於「離散」的歷史關注，不能夠被「後現代」、「後結構」以及「差異」等字眼所取代一樣；第二，「背叛」雖然是痛苦的，但卻並不一定是負面的。「背叛」可以推陳出新，帶我們走進新的話題及新的格局。但這個另類的政治結構會不會具有新的道德盲點，是「背叛」本身所無法控制的。這也就是為甚麼我們需要提醒自己「背叛」的倫理訴求；第三，「背叛」吸引我的地方恰恰在於它不是一個公式和理論，它是具體的、和特定的語境有密切的關係。作為在特定歷史情境中生發的事件或行為，它為我們提供了進入歷史的視角。

二 馬華文學的「國籍」和「文學性」

我讀過的馬華文學作品中，起碼有兩部作品牽涉到「背叛者」作為主角或是以「背叛」作為敘事角度，而又是以太平洋戰爭為背景的。一部是1960年代曾經擔任馬來西亞文學雜誌《蕉風》主編的黃崖所著的小說《煤炭山風雲》，另一部是當代馬來西亞作家陳團英（Tan Twan Eng）的英文小說《夕霧花園》（*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⑤。兩部作品南轅北轍：一部是英文作品，一部是中文作品；一部借力於近幾年才出現的世界文學建制——曼氏亞洲文學獎（Man Asian Literary Prize）而紅極一時，另一部出版於1968年的香港，正值風雨飄搖的冷戰之中，其寫作的筆法和風格只能算作「中額文學」（middlebrow literature），令人想起同時期的其他有關太平洋戰爭的作品，比如徐速的《櫻子姑娘》和《星星、月亮、太陽》等。究竟兩者有甚麼可比性呢？

這兩部作品的並置，正體現了當下馬華文學的核心問題。在《回到馬來亞：華馬小說七十年》一書的序言中，張錦忠提出用「華馬文學」（華裔馬來亞文學）來取代「馬華文學」，認為華馬文學所指向的「族裔文學」正可以用來取代馬華文學的「語文取向」^⑭。由此便衍生出除了華文（華馬華）寫作之外，用馬來文（華馬馬）以及英文（華馬英）寫作的文學。張錦忠指出^⑮：

華馬馬、華馬英與華馬華之間鮮少往來互涉，主要在於華馬作家以各自熟操的語文為邊界，而非朝「無邊界」……的思考趨向折轉，也就難免劃地自限之弊。這種同一族裔文學的內部疏離問題，是否可由翻譯與跨語書寫解決，還可以在論述的領域進一步探討。……「將來的（華馬文學）社群」是否即跨語社群，我也無法可定。我的疑慮還是來自承認政治的問題。亦即：跨語之後呢？

在我看來，張錦忠的「疑慮」並非是出於一種對現實的悲觀或謹慎的考慮，它的背後是帕里克已經提出的問題——前文提到的關涉到所謂「從屬、認同，以及被驅逐以外的複雜性」。雖然張錦忠沒有用「背叛」這個字眼，但他的觀點和帕里克對於「背叛」的思考有暗合之處。張錦忠也認為「跨界」、「雙語」未必就能夠使一個作家得到不同的文化社群的承認，「多聲複調」是過於樂觀的看法。帕里克對此有更深刻的思考，她寫道^⑯：

我認為民主政治和社會正義不應該按照理羅蒂（Richard Rorty）所提倡的那種「更為廣泛的忠誠」（a larger loyalty）來理解。羅蒂認為「更為廣泛的忠誠」是為了建立一個以我們和他者的信任為基礎的社群，但是這種將「忠誠」廣泛化的做法實際上是先要強迫他者認同自己，以此為條件才能接受他者，而不是把他者僅僅作為他者來看待。其實，作為他者的他者應該看成是先於自我的存在，並且是使得自我得以確立的根本條件。

帕里克提出的是一個差異問題。如果「忠誠」必須要以抹殺差異為前提，那麼這種「忠誠」是很可怕的。當然張錦忠並沒有從倫理政治的角度來論述，但是他對馬華/華馬文學的複雜性的深刻體會，實際上是在提醒我們不管怎樣包容，都不應該也不可能除去差異性。

在另一場關於馬華文學的討論——莊華興與黃錦樹關於馬華文學的「國籍」的討論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如何看待差異、如何看待作為國家話語的「更為廣泛的忠誠」是兩位學者所關注的焦點。可以說，莊華興的觀點更接近於羅蒂「更為廣泛的忠誠」的立場^⑰，而黃錦樹的觀點則更接近帕里克反思「背叛」的立場。

作為馬華文學批評界的「壞男孩」，黃錦樹的文學批評以及理論敘述不時能夠體現出「背叛」這個視角對於我們思考多元民族的國家政策可能帶來的啟發。美國華人作家哈金在〈語言的背叛〉（“The Language of Betrayal”）中曾經問到：「歷史總是指責個人背叛國家，為甚麼不能反過來問一問國家有沒有背叛個人呢？」^⑱黃錦樹對於「國家文學」宰制的批評與哈金的思路有異曲同工之

處。這裏強調的不是他的結論，而是他的論理方式。比如有關「本土性」，黃錦樹在〈Negarakuku——旅台與馬共〉一文中寫道¹⁹：

擺脫盆的圓限可能是脫離困境的辦法之一，但相應的代價或問題在於，是否會有「失根」甚至衍生出政治忠誠問題？……昔日以方言，地方色彩，此時此地的現實為形式及內容的規範，以作為馬華文學獨立之保證的馬華文藝獨特性的規定，原就具有強烈的政治道德意味。它卻是認同的標誌，是華人唯恐自身的忠誠被懷疑而為文學設下的限制……那是虛構的門檻（必須一定程度地寫實），一旦跨越，文學的國籍身份就可疑了。

黃錦樹在這篇文章中提醒我們注意「本土性」對於文學身份的規範作用。他告訴我們「背叛」的可能性，不管面對多麼冠冕堂皇的國家政策以及文學範疇，都有可能甚至有必要出現。「背叛」是面對既有的歷史觀念和文學範疇的質疑時必須做出的十分糾結的選擇。這種對於歷史的重視，使我們不能簡單地把他的結論歸結成幾個關鍵詞，比如「離散」、「遊寓」或者「無國籍」。他的「無國籍」不等於「去國籍」，正如同輕而易舉的背叛、沒有任何道德負擔的背叛，實際上並不能體現「背叛」的生產意義。

黃錦樹的論述告訴我們，文學的位置是在個體與群體、本土性和普遍性之間的張力中存在的。比如在〈華文少數文學——離散現代性的未竟之旅〉這篇文章中，黃錦樹借用奈波爾（Vidiadhar S. Naipaul）的案例講述了南洋文學的悖論²⁰：

在某種程度上，奈波爾寫出了郁達夫所期待的南洋作家……尚力所未及的可能世界。就自身及族群經驗而言，那世界似乎是特殊的。但從被殖民經驗與殖民建制來說，那卻是集體的。但弔詭的並不是憑靠無名無聲的集體，而是超凡的個體，似乎完成了數代人的努力。

黃錦樹的主要觀點是，這種「特殊性」與「集體性」的弔詭，既不同於所謂「離散的中國性」（diasporic Chineseness），也不同於「本土性」，因為正如他指出的那樣，「本土性」是「不可能的本土性」。這些對於既有的文學範疇的反思和警醒，在我看來也是從「背叛」的角度出發來思考問題的。

我們應該如何借用黃錦樹對於「文學性」的深入看法反觀馬華文學史呢？黃錦樹強調的是文學性對於社會功用和社會學範疇的「背叛」，以及與之相關的現代派和寫實派之爭。黃錦樹對於「『為社會而文學』文學作為啟蒙教化，反帝反殖，階級鬥爭的武器」的文藝思想批評有加²¹。他認為現實主義是「國家與民族主義的綁架——尤其是在那無望的族群政治的氛圍裏」，並進而指出，實際上，新的「忠誠」應該是文學「回到它自身」²²。

但是，我們如果秉承黃錦樹對於文學規制反省的思路，有沒有可能提出這樣的質疑：「寫實」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國家與民族主義的綁架」，而「回到（文學）自身」又是否能夠成功地擺脫這樣的「國家與民族主義的綁架」？「回到（文學）自身」看似讓我們落到了實地——文學，但是存在於「國家和民族」的

場域裏的文學，恐怕其指涉性既是不能去除，也是無法控制的。如果文學對於社會的「背叛」讓我們打破某些簡單化的二元對立的窠臼的話，那麼「文學」大概也不應該按照羅蒂所提倡的「更為廣泛的忠誠」來想像，把所有流派都妥帖地囊括在內。我並不是說這是黃錦樹撰文的最終意圖，而是希望從他的思路生發出對於文學史的反思。而本文的研究案例恰恰是馬華文學中的現代派作家黃崖等人；把他與陳團英並置，使我們明確地看到不同時期的馬華文學所置身的多重的角力場 (force field)。「回到(文學)自身」一方面是為文學脫離一個世界而接軌於另一個世界提供了政治手段，另一方面也是文學世界對於這個充滿了暴力的不均衡的世界的回應。

三 馬華文學的現代主義與冷戰

遠在1955年6月29日，《蕉風》創辦之前，美國亞洲基金會 (Asia Foundation) 馬來亞的代表在給基金會主席的通信中，明確地指出了對待馬來亞文化活動的兩個不同方法，指出《蕉風》雜誌的主要任務是團結學生團體中的中間派，在內容上盡量不進行反共或其他政治宣傳；同時不應對當地政府作出批評，並需要弘揚民主自由精神等等²³。這幾項要求證明這個雜誌的「遠離政治」實際上是有政治考量在其中的。

但是如果純文學是一種從上至下的規劃，其規劃者卻無法完全控制文學與文字的指涉性，那麼真正意義上的「純文學」與政治的距離是很難完全事先設計的。這在文獻上也有反映，比如《蕉風》出版不久，美國亞洲基金會地方官員就在給總部的報告中指出²⁴：

編輯人員對於雜誌的純文學性以及更為廣闊的社會政治目的之間的協調仍然不大清楚……似乎編輯對於馬來亞作者和讀者傳輸現代中文的美學價值和形式特點更為重視。而對於新馬華人如何回應馬來亞的國家要求以及對馬來亞表達忠誠仍然不夠重視。

由此可見，從美國亞洲基金會的角度看來，他們對於中文的純文學的追求並不是百分之百放心的。「現代中文的美學價值和形式特點」始終令人不放心，會引起是否有效地「回應馬來亞的國家要求以及對馬來亞表達忠誠」的懷疑。

上述文件給我們描述了一個世界政治勢力的角力場，並決定了馬來亞的「純文學」的美學位置。當現代主義作家與國家宰制以及世界霸權的宰制進行斡旋、洽商，以求妥協以及共存時，其文學實踐的美學性與社會性同時彰顯出來。我們以這種認識為基礎，去解讀黃崖1968年在香港出版的小說《煤炭山風雲》，也許可以反問當時的箇中之人是不是對這個複雜的政治環境沒有意識？我覺得恐怕恰恰相反。「現代主義」的意義恰恰在於它試圖現實性地描寫當下複雜的政治環境。

黃崖在《煤炭山風雲》的〈後記〉中寫到：「在沒有來到馬來亞之前，我已經熟識煤炭山的名字。最先，我是在『馬來亞共產黨史』中，知道煤炭山是馬



1960年代曾經擔任馬來西亞文學雜誌《蕉風》主編的黃崖。(圖片來源：《香港筆叢》，1993年創刊號，頁103。)

共的發源地。後來，《桂河橋》影片上映，一篇討論緬甸死亡鐵路的文章，提到很多築路工人都來自煤炭山，自此，煤炭山的名字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²⁰這段文字表明，馬共的歷史對於一個並非左派的文化人來說，具有一種神秘的吸引力。接着，他描述道²¹：

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了二十年了，但煤炭山仍然充滿了戰爭的創痕。在這裏，我似乎可以聞到炮火的煙味，聽到受難者的痛苦呻吟，也似乎可以看到日本侵略者的猙獰面目，聽到抗暴者的憤怒呼聲。戰爭，戰爭！它離我是如此接近，幾乎在包圍着我，我在很多焚毀的建築物前徘徊，在被破壞的馬路上躑躅，好像我找到了很多東西，又好像甚麼都沒有找到。

雖然黃崖在小說裏描述的是抗戰時期的故事，但他不可能不知道抗戰和冷戰之間的聯繫。所以，這個關於煤炭山的抗戰故事，實際上是對於戰爭作為生活狀態的想像，同時也就是對於冷戰的想像。我認為他是以「背叛」的角度介入這個想像的。

黃崖在小說中塑造的主角是一個自稱為「沒有國家觀念，也沒有正義感」、「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只顧個人利益」的劉醫生²²。在小說中，劉醫生在英國人撤退之後擔任醫院的院長，他本來是無意抗日的，只是後來被游擊隊員用槍逼着救治了傷員。小說的核心價值觀念可以說是超越國家種族之上的人道主義，當這個原則被違背時，從劉醫生的角度來說，不管日本人還是游擊隊都是殘暴的。同時，愛情被看成是人道主義的一個重要部分。所以，只有當劉醫生心愛的女人美珍被日本軍人槍殺了之後，他才開始願意真心參加游擊隊。自始至終，劉醫生都不是一個堅定的抗日份子，他一直介於抵抗者 (resister) 和合作者 (collaborator) 之間的模糊位置。比如在被捕受刑之

後，他同意與日本人合作，替他們打入游擊隊做間諜，之後又後悔。在小說結束的時候，他成功地逃離了日本人的控制，被游擊隊搭救。

小說主角的行為構不構成「背叛」，直接牽涉到我們是否認為「背叛」也需要以某種清晰可見的「忠誠」為基礎。劉醫生這個主體對於戰爭中的敵對政治勢力的「忠誠」並不清晰，而徘徊不定的主角相對於被臉譜化的對立方來說，因為其複雜性而贏得了讀者的同情。這種複雜性與從魯迅以降的現代文學中的「個體」意識一脈相承。而作為「背叛者」的劉醫生提醒我們，到了二十世紀中期，強勢的政治力量以及僵化的意識形態對於作為個體的「人」展開了多方面的拉扯。值得研究的是，小說為甚麼要把一個「非英雄」放在中心呢？在小說結尾處，當游擊隊員把劉醫生宣傳成「偉大的抗日英雄」時，劉醫生自己認為「我是懦夫，不是英雄」，「我有一種悲哀的感覺，但只是一瞬間，這悲哀就煙消雲散了」²⁸。如果小說的核心價值是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話，那麼它的「個人主義」並不是美國主流意識努力傳播給全世界的、帶有勝利者腔調的「個人主義」。這個小說最「現代」的地方在於它的感情內核，傳遞了一種對於歷史和集體的懺情式的感傷。這種感傷，我認為既是一種心理結構，也是對冷戰時期的社會政治狀況的回應。

這種感傷還有另外一個倫理的意義，集中體現在「背叛」之後所不能消解的一種負咎感。小說裏的劉醫生在感情上十分接近於另一個角色安娜。安娜曾向日軍告發醫院裏的工作人員的抗日活動，因此可以說是真正的背叛者。安娜認為自己和劉醫生是同一類人，同樣受英語教育，與只能在華人社會裏面翻跟斗的游擊隊員或者美珍等角色不一樣。然而，劉醫生最後卻只能把幫助過他的安娜犧牲給追趕上來的日本兵。自始至終劉醫生都沒有辦法在意識的層面上承認他對安娜的感情。即便當劉醫生能夠說服自己，對於政治團體的背叛是對於自我的忠誠，他也沒辦法解釋為甚麼在關鍵的時候把安娜拋在後面不管。在作為普世價值的「人道主義」面前，安娜是一個沉默的、被忽略的「他者」。通過這個角色，小說展現了「個人主義」殘酷自私的一面，更提出了「背叛」之後該怎麼辦的問題。這令我們聯繫到張錦忠有關馬華文學的提問——「跨語之後呢？」²⁹

這部小說告訴我們，正如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終將面臨現實的考驗，冷戰另一面的價值觀——無論是人文主義、個人主義還是自由主義，實際上也在現實中（這裏指的是位於地球另一端的與歐美不一樣的現實）受到挑戰。如果說像黃崖這樣的作家所從事的文學實踐屬於「現代主義」的話，那麼他們並不是簡單地在複製一套既有的價值觀和美學觀；相反，所謂「現代主義」恐怕是一個處理複雜的政治現實的視角和手段。

四 華馬文學中的「背叛」主題與世界主義

冷戰時期二元對立的世界已經過去，它給我們留下的遺產在一定意義上是根深蒂固的族群認同。陳團英的《夕霧花園》身處的世界是一個以「多元文化」和「差異」作為關鍵詞的世界。作者又是如何處理「背叛」這個主題？

《夕霧花園》描寫的是二戰之後，日本集中營倖存者張雲林與曾經擔任天皇的御用園藝師中村有朋的愛情故事。小說的核心是個謎——有朋是自願來到馬來亞的，還是被天皇派來的間諜？他到底多深入地參與了「金百合」計劃（日本政府戰爭期間在東南亞掠奪當地文物以及金銀財寶的機密計劃）？這些到小說最後我們都無法完全證實的問題，牽涉到問題的核心——他是一個「背叛者」嗎？作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非常委婉，他只是提到當有朋聽完雲林敘述自己在集中營裏的經歷後，就不再對着天皇的照片鞠躬，甚至不再讓天皇的形象留在牆上。如果戰爭受難者的記憶改變了有朋的信仰，促成了他對於天皇的背叛的話，那麼這個背叛給受害者帶來了甚麼？有朋的藝術對於雲林的療傷到底具有甚麼樣的作用？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理解作品所不斷強調的藝術和戰爭之間的張力。有朋曾經常常「想像自己身處在一個空白的空間裏，位於地圖測繪者手中的標尺之中」^⑩。這句話很弔詭，因為「空白」一方面意味着置身事外，另一方面並不是沒有被界定過的地方。這個「空白」只不過是繪圖師的標尺所界定的兩點之間的空白。有朋就是因為非常善於在被界定的非常嚴密的「空白」裏求自由，才能夠生存下來。他的模糊性，他的狡猾，他的入世，決定了他如何處理「背叛」這個問題。

「空白」這個概念在小說裏的其他地方又得到了進一步的闡述。「空白」首先具有空間性，指涉了「夕霧」——正是有朋用上大半生的精力在馬來亞建造的日本花園。「空白」還具有時間性，有朋曾經說不希望「緊急時期」過去，因為戰後的「緊急狀態」延續，戰爭就像是繪圖師的標尺，界定了這個相對自由的「世外桃源」^⑪。仔細玩味一下這句話，我們還會意識到它代表了小說對於傳統藝術和現代性的結合。小說一方面花了不少篇幅表達了對於日本傳統美學觀念的仰慕和崇拜，另一方面又把這個傳統的美學納入現代化的建制中，為現代性的工程所用。戰爭就是一種現代性的工程和建制。具體說來，這兩點的融合反映在有朋以及他所代表的日本美學所生產出來的產品之上，而這個產品就是夕霧花園。花園並不只是由自然構成的，不只是供人觀賞的，更是有朋在雲林背上刺青，留下來的地圖中的一個方塊。這一方塊看上去像是東方藝術中慣常使用的技巧——「留白」，但是它不僅僅是一個留白。按照小說中日本學者吉川達治所畫的夕霧花園地圖來看，雲林背上的留白實際上正是花園的位置。如果地圖的功用取決於它能否精準地體現地標之間的相對距離和位置的話，那麼有朋這個精準的繪圖師，非常清楚他的花園與集中營，以及他的藝術與戰爭之間的相對距離和位置。兩者並不是重合的，但也沒有相去甚遠。

相比之下，背叛對於另一個角色雲林來說就直接得多。雲林為了生存，在集中營曾經告發過其他的營友，這只能算一個小小的背叛；更大的的是她對於有朋的感情是否對自己的戰爭記憶構成一種背叛。對於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應不應該轉換成對於敵人的文化的排斥呢？這是一個核心問題。通過雲林這個角色，小說引出了怎樣處理文化融合、種族融合以及創傷記憶的關係這些關鍵問題。



在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被捕的叛軍。(資料圖片)

小說一方面暗示了文化以及文化交流與戰爭的深入關聯，另一方面又試圖通過文化上的「世界主義」來解決歷史遺留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代表還不是在檳城長大的海峽華人 (Straits Chinese) 雲林，而是他們家的好朋友，來自南非的麥格納斯。因為麥格納斯在馬六甲發現了自己荷蘭祖先的足跡，才決定不回家，就在馬來亞落地生根。通過麥格納斯，作者強調文化和種族融合是馬來亞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小說並不是空泛地讚美多元文化主義，而是要把這個文化圖景放在歷史中來考察。當戰爭不可避免地帶來國族以及種族之間的紛爭時，讓一個人去愛上別的種族的文化，尤其是那曾經是敵人的文化，這算不算是一種對本族的背叛？如果雲林代表一種文化背叛的話，作者想要安慰我們的是——文化上的「世界主義」是具有療傷作用的。

但是，小說中所弘揚的包容性能不能面對戰爭的創傷卻是很值得懷疑。首先，得到文化救贖的並不包括所有的敵人，比如小說對於冷戰時期的敵人，對於那些被簡稱為“CT”（共產主義恐怖份子，英國殖民政府對馬共游擊隊員的稱呼）的人，就沒有試圖通過文化的溝通來化解衝突及仇恨。“CT”自始至終並沒有改變其存在的狀態，他們只是一個符號，一個簡稱，一個隱身於黑暗之中的威脅。還有一個陰影就是生活在森林之中的土著。他們也是非常邊緣的存在，並沒有在小說的倫理考量中佔據任何位置。這些被忽略的「他者」界定了小說倫理世界的範疇。準確地說，當小說着眼於跨亞洲 (inter-Asia) 或者是以海洋為中心的跨界關係，把馬來亞的歷史置身於一個極其廣闊卻又出乎意料的「世界性」之中時，卻偏偏省去了耳熟能詳的冷戰歷史以及被敘述過無數次的敵我關係。

五 結論

《夕霧花園》這樣一個對於馬華文學的「世界性」的界定，是怎樣體現了華馬文學的有/無國籍，是否體現了張錦忠曾經指出過的英文小說的「境外營造」的境遇和焦慮？我因為對於這個類型還缺乏足夠的社會歷史的認識，所以還不能給出結論。但是，從黃崖到陳團英，從張錦忠到黃錦樹，文學的實踐者和批評家都不斷提醒我們馬華文學本身的跨種族、跨語言、跨地域的世界性。關鍵是，這個「世界性」是否應該被想像成一種「從屬」——「從屬」於國家、母語，或者某種後現代、後結構主義的理論話語——還是應該在文學與現實世界的碰撞中體現出來，我覺得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對於「背叛」這一話題的思考，或許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可用的角度和思路。

註釋

① 在關於馬華文學的討論中，張錦忠等人曾建議啟用「華馬文學」這個觀念，以囊括華裔作家用馬來文或者英文所創作的文學。本文第二節對此有所討論。個人的解讀是這場討論是以開發「馬華文學」的多元化為目的的，不應該因為有此討論就取消了「馬華文學」這個詞的可用性。本文繼續沿用「馬華文學」這一個慣用字眼，同時認為有必要不斷討論其內涵與外延的複雜性。如果把「馬華文學」看成是一個複雜的多語種多種族的範疇，那麼把下文討論的陳團英的英文小說稱為「馬華文學」也不為過。

② 李有成：《離散》（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3），頁14-15。

③⑤⑫⑬ Crystal Parikh, "Introduction: An Ethics of Betrayal", in *An Ethics of Betrayal: The Politics of Otherness in Emergent U. S. Literatures and Culture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1-28; 8-13; 2.

④ 除了帕里克 (Crystal Parikh) 的專著，本文還主要參考了以下有關「背叛」的英文理論敘述，包括：Nancy K. Miller, *Bequest and Betrayal: Memoirs of a Parent's Death*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Leslie Bow, *Betrayal and Other Acts of Subversion: Feminism, Sexual Politics, Asian American Women's Liter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Ha Jin, *The Writer as Migran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⑥ 參見 Leslie Bow, *Betrayal and Other Acts of Subversion*。

⑦ Crystal Parikh, *An Ethics of Betrayal*, 32.

⑧ Jing Tsu,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ap. 4.

⑨⑩⑪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載王德威主編：《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出版，2007），頁36；33；48。

⑬ 黃崖：《煤炭山風雲》（香港：新文化事業供應公司，1968）；Tan Twan Eng, *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 (New York: Weinstein Publishing, 2012)。此書已有中文版，參見陳團英著，莊安祺譯：《夕霧花園》（台北：貓頭鷹，2015）。

⑭⑮⑲ 張錦忠：〈序論：七十年家園〉，載張錦忠、黃錦樹、莊華興主編：《回到馬來亞：華馬小說七十年》（Selangor D.E., Malaysia：大將出版社，2008），頁4；19；19。

⑰ 莊華興：《國家文學——宰制與回應》（Selangor D.E., Malaysia：大將出版社，2006）。

⑱ Ha Jin, "The Language of Betrayal", in *The Writer as Migrant*, 31.

⑲ 黃錦樹：〈Negarakuku——旅台與馬共〉，載《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台北：麥田出版，2015），頁286。

⑳㉑㉒ 黃錦樹：〈華文少數文學——離散現代性的未竟之旅〉，載《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頁 225；219；218。

㉓ 原文如下：“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Society and the Malayan edition of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openly associated with the Union Press, will continue to help organize, strengthen, and expand that student grouping which is either clearly anti-Communist or fairly strongly inclined toward an anti-Communist posi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ao Feng Society and its publication, Chiao Feng, locally organized and completely disassociated publicly from the Union Press but under the close supervision of Union Press and Chinese Student Weekly leaders, will help organize, strengthen, and expand the middle block of unorganized students, with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swinging this block away from the Communist front.... Accordingly, the Chiao Feng Society has established the following policies for its publications: 1. The magazine should not, in the first phase, appear to be overly anti-Communist or discuss any political issue. 2. The magazine should not criticize or express resentment against the local governments. 3. The magazine should advocate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and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freedom. 4. The magazine should contain primarily literary and educational materials by local Chinese students, teachers, and writers and should always present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Malayan materials of similar character. 5. The magazine should also contain the best such materials from sources other than Singapore/Malaya. 6. The magazine should engage quietly and carefully in the organization of student activities which will constitut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Malaya and strength for the free world.” (File: MEDIA Publications Chiao Feng [Union Press Student Garden Fortnightly], Malaya/Singapore 103,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Box P-135,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㉔ 原文是 “[T]here still exists, we believe, some confusion in the minds of its editors between purely literary aims and broader, more fundamental aspects. As has also been the case to a certain extent with the I-Lien Dramatic Society, Chinese cultural and literary values have tended to obscure or replace the long-term social and political goals. Too great an emphasis, it seems, is placed on instilling in the general leadership and Malayan-born contributors a sense of and feeling for the stylistic and aesthetic values of modern Chinese prose and poetry and too little on the over-riding needs of the Chinese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to face up to the needs of Malayan nationhood and Malayan loyalties. If Chiao Feng is to contribute to and assist in the Malayaniz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residing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thereby lending support to major policy aims of both governments, more attention must be paid in the future to the literary efforts of local writers, expressed in their own idioms and having a general Malayan tone and setting. Correspondingly less attention and space on its pages must be accepted to Hong Kong and Taiwan writers who serve divergent goals and purposes.” (File: MEDIA Publications Chiao Feng [Union Press Student Garden Fortnightly], Malaya/Singapore 103, Program,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Box P-135,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㉕㉖ 黃崖：〈後記〉，載《煤炭山風雲》，頁 193。

㉗㉘ 黃崖：《煤炭山風雲》，頁 190；188。

㉙㉚ Tan Twan Eng, *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 284.